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摘要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444-552页。

摘要节选自：阮青等著、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组织编写：《十五部马恩经典著作导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总结1848年法国革命斗争经验的重要著作，是由马克思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撰写的系列文章组成。马克思原计划写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后来只发表了前三篇，总标题是《从1848年到1849年》。1895年，恩格斯将这组文章编成单行本在柏林出版，并将总标题改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在编校过程中，恩格斯增添了第四章，即《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发表的《时评·1850年5-10月》中有关法国的事件的部分，并将标题命名为《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一、历史背景和写作原因

1848年一场汹涌澎湃的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各阶级、阶层和政党都被卷入革命漩涡之中。这次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消灭封建统治和封建残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法国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法国二月革命推翻了金融贵族的七月王朝，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战斗。由于这时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大大减弱，作为这次革命主要力量的无产阶级尚未成熟，特别是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背叛，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革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这次革命毕竟沉重打击了法国的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特别是无产阶级通过这次革命认清了资产阶级的真面目，抛弃了对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而促进了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结合，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前提。

法国革命不仅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而且为其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新材料和新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这次革命，用他们的理论指导革命，为之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在革命失败以后，又及时进行了极为出色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总结，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法国革命的典型性和巨大影响，马克思对法国革命进行了重点总结，写下了《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光辉篇章。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等重大事件，剖析了法国的阶级结构以及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第一次使用了“工人阶级专政”的概念，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著名论点，并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

二、主要内容和基本理论

《法兰西阶级斗争》包括一个前言和四章正文。

《前言》，说明了1848年至1849年法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马克思认为，评价革命的历史作用不能完全根据表面的经验所得到的结果，而应该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研究。这是马克思研究法国革命的一个总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认为，当时法国革命虽然失败了，却使得无产阶级摆脱了二月革命以前还没有摆脱的东西，即抛弃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等人物，丢掉了把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成“社会共和国”一类的幻想，甩开了争取劳动权之类的模糊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改造社会的各种方案，使得他们逐渐确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正是革命的失败使主张变革的政党，在同强大敌人的斗争中逐渐变得成熟，不断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发展成为真正革命的政党。因此，虽然这次革命失败了，但它对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1848年的六月失败》，分析1848年二月革命到六月起义的历史，论述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思想。

《1849年6月13日》，分析1848年六月起义失败到1849年6月13日事件期间的历史，说明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妥协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阐述了个人与时代、与阶级的相互关系等重要思想。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叙述1849年5月28日到1850年3月10日立宪共和国的历史，分析建立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重要论断，阐述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的重要思想。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叙述1850年3月10日后到波拿巴政变前的历史，论述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

阅读这部著作要掌握的基本理论有：

（一）建立工农联盟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斗争都是阶段斗争的表现，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状况及其生产发展水平，所以分析历史事件首先要注重分析其经济原因。马克思详细分析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前夕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二月革命前的七月王朝是金融贵族的反动统治。七月王朝对内横征暴敛、专横腐败，通过发行公债、利用铁路建筑等手段，谋求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和满足金融贵族的私欲。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它为了自身的利益反对金融贵族。而在七月王朝统治下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也越来越愤怒。七月王朝对外不惜屈辱以乞求和平，反动的对外政策使法国的民族情感受到了凌辱，唤起了人们对革命的回忆和热情。另外，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加剧了人民生活的贫困。1847年英国工商业总危机则对法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使法国小资产阶级大量破产。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社会形势下，二月革命爆发了。

马克思指出，在二月革命中产生的临时政府，是参加革命的各个不同阶级间妥协的产物，这些阶级虽然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是他们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而且资产阶级的代表占了大多数，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企图摆脱工人的影响并且将内阁中的一切职位瓜分一空。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之下，临时政府不得不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无产阶级“所获得的只是为自己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基于工人阶级的强大压力，临时政府勉强设立了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负责寻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实际上，这个委员会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资产阶级把实际的国家权力和行政枢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时的工人阶级还不成熟，实现自己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在主观上，无产阶级的觉悟不够高，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他们沉溺在所谓宽大，仁慈的普遍博爱气氛之中，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看作自己的产儿，对资产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客观上，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却想方设法削弱无产阶级。他们通过保证国家信用的各种措施满足金融贵族对其他阶级的剥削，从而与他们勾结在一起；通过加税和造谣，挑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通过建立以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别动队，来分裂无产阶级，为镇压无产阶级准备好武装力量；通过把十万失业工人编进所谓国家工厂，妄图进一步分裂工人队伍，并使得小资产者不满并仇恨无产阶级。这样，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3月17日，无产阶级本来是要用示威游行迫使临时政府回到革命轨道，结果却暴露了无产阶级缺乏采取坚决行动的模棱两可态度，也加强了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的决心。4月16日，临时政府和资产阶级编造了有人要推翻临时政府的谎言，导致了一场有意制造的动乱，并以此为借口把军队召回巴黎。5月4日，制宪国民议会开幕，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国民议会把原临时政府中的两个无产阶级代表排除出执行委员会之外，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利用无产阶级5月15日冲入国民议会的事件逮捕了工人领袖。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许多挑衅性的法令，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了公开向工人挑衅、侮辱和谩骂工人的言论。6月21日，执行委员会发布命令，强行把一切单身工人逐出国家工厂，或者编入军队。这一切逼着工人只能发动起义。然而，由于无产阶级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经费和武器，起义最后失败。

工人起义的失败说明法国无产阶级必须寻求革命的同盟者。法国是一个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站在资产阶级的一边，无产阶级孤军奋战。马克思强调：“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表明，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必须努力争取并联合农民和小资产者，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这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对于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的国家来说，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论述了在革命斗争中小农阶级和小资产者向无产阶级靠拢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当资产阶级自认为统治稳固之后，在资产阶级专政正式确立之后，资产阶级没有必要再利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来对抗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而日益沦为资产阶级的压迫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社会的中间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必定会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把他们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

马克思揭露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质，明确提出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六月起义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出了原形，它是巩固资本统治和奴役劳动为其公认任务的国家。这就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试图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改变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决不能对资产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六月起义及其失败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觉醒，使它明确认识到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个集团都不可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只能通过自己的、不依赖任何资产阶级集团的独立斗争来争取和维护。工人阶级的革命口号只能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这个口号集中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治要求；只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工人阶级专政，才能求得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

（二）个人与时代、与阶级关系理论

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武器，分析了从1848年六月起义失败到1849年5月8日资产阶级共和派垮台的历史，揭露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动性与妥协性。在六月斗争中胜利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镇压了工人的革命力量，公然破坏了与小资产阶级的同盟，一度掌握了国家政权，并通过制宪议会控制了立法权。他们在制宪议会里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迫害六月起义者，同时又用一些法令和规定来消除革命浪潮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恢复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他们为了迎合大资产阶级的诉求，而严重侵害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导致了小资产阶级的大量破产。他们抬高别动队的待遇与薪俸，使军队感到恼怒。他们在外交上依赖英国，屈从于神圣同盟，丧失了民族气节。这样，资产阶级共和派就丧失了各方面社会力量的支持，最终在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中失败。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路易·波拿巴则利用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尤其是利用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

民所迷信的“拿破仑观念”这个有利因素，轻而易举地登上了总统宝座。拿破仑上台不久便任命奥尔良派的巴罗为总理。巴罗内阁革除了共和派所占据的一切高级职位，恢复旧日保皇主义的行政机构，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共和派，作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掌握了国家政权。

马克思分析从1849年5月到6月13日这段时期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战胜小资产阶级山岳党的历史事件，说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动摇性。马克思指出，在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围绕着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运动，有两大集团相互敌对：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成立的，但只是在1848年12月10日以后，当它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决裂后，才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貌：它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党派。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而正统派则是大地产所有者。而所谓红党则是工人的党与小资产阶级的党为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所结成的政党。其中，山岳党作为小，资产阶级政党成了联合革命力量的指挥官。法国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表现为政治上的摇摆性、斗争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山岳党代表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人群的诉求。1849年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小资产阶级提出的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反宪法而炮轰罗马的控诉书之后，山岳党没有勇气举行武装起义，反而在6月13日举行所谓的和平游行，结果游行被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被打败了，而代表金融贵族和大地产所有者利益的秩序党获得了政权。

马克思批判制宪议会通过的共和宪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社会经济改造方面的任务。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后提出的劳动权，只不过是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权只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视野。所以无产阶级在社会经济改造方面的要求，不是可怜的劳动权，而是要使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马克思在分析秩序党与山岳党的冲突时，阐明了历史上的个人与其时代.与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关系。从1848年到1849年的革命实践来看，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各阶级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阶级的活动往往是在其代表人物的组织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那些个人，对一定时期内的历史事件就会产生重要影响，历史的焦点往往会集中在这些个人的身上。在1848年至1849年的革命中，各个阶级、阶层或党派都创造了自己的“伟大人物”。马克思认为，不是英雄创造历史，不是个人左右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是历史造就人物。个人不过是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代表而已。他引用爱尔维修的话对此作了阐述：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就是说，杰出人物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的产物，是时代和人民客观需要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杰出人物之所以成为杰出人物，就个人来说，取决于个人认识历史发展趋势和反映人民群众要求的正确程度，同时也与个人的知识、经验、意志、性格、品质、作风等相关。但是，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历史条件，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社会性质、历史地位及其发展程度，取决于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拥护程度。因此，历史不是由所谓英雄人物创造的，而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三）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理论

马克思全面研究了1849年5月28日到1850年3月10日立宪共和国的历史，通过考察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历史，明确提出了工农联盟的历史必然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农民的特殊经济地位决定其具有两重性：既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又具有保守性的一面。在法国革命中，农民既被资产阶级所利用，最终又被资产阶级所出卖和抛弃。在法国革命中，共和派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都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反而使之处境更加恶化。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农民和无产阶级都受到资本的残酷剥削。农民只有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接受无产阶级领导，才可能获得解放。随着农民处境的恶化，他们渐渐觉醒，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自己利益的一致性，而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则变得不可调和。

马克思高度评价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强调革命是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著名论断。革命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平时被压抑的历史创造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沉重打击反革命势力，有力扫荡历史前进的障碍，从而大大加速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于具有生命力、有历史前途的阶级来说更是如此。对于那些过去受剥削但尚未觉醒的阶级来说，革命是他们的启示录，在革命斗争中获得的失败和胜利、经验和教训，使得他们本身得到锻炼和考验。这样，他们就愈益成为革命的积极力量。而无产阶级本身也正是通过革命斗争才发展和成熟起来。即使失败了革命对于推进历史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不具备胜利条件的革命为未来的革命创造着客观的胜利条件。

马克思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当时法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秩序党统治下，不仅无产阶级，甚至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都受到迫害。于是，他们纷纷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反抗。对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来说，标榜把解放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目的，不是故意欺骗就是自我欺骗。这些社会主义流派除了为其所代表的阶级服务外，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们不懂得真正的革命途径，也不能最终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马克思告诫说，无产阶级绝不能追随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流派，而必须强调革命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不断革命”的思想表明，无产阶级绝不能把革命停顿在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狭隘视野和行动范围内，而是要坚持自己的阶级利益，并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把革命转变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私有制，最终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可见，无产阶级革命比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革命，要广阔得多、深刻得多、彻底得多，是后者所不可比拟的。

（四）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进行革命的原因，论述了关于革命发生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原理。1849年和1850年法国出现的经济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新的革命的尝试，表明了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新的革命高潮不可能像前一段时间所预期的那样很快到来。因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纳不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时，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也就是说，从总体的发展趋势而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孕育着必然来临的革命，这是无疑的，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而否定革命：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从具体历史条件讲，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尖锐矛盾的时候才会发生，幻想革命可以随时发生或者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都是错误的。